

《党的光照射我心:〈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姚筱舟的初心故事》

## 正声雅乐形成的文化内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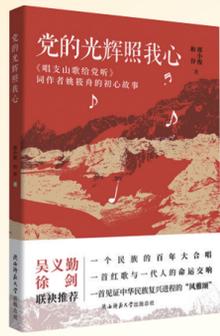
□邢美芳

由邢小俊、和谷所著的报告文学《党的光照射我心:〈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姚筱舟的初心故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巧妙地以“风雅颂”的艺术结构,追溯了歌曲形成的真实故事,提炼出正声雅乐、人民经典的文化演进内核,是一部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建构中国文化的典型作品。

作品讲述了煤矿工人蕉萍(真名姚筱舟)创作的诗歌,经过模范人物雷锋摘抄、作曲家朱践耳谱曲、歌唱家任桂珍和才旦卓玛先后演唱,最终成为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过程。其中个人的命运形成几重复调结构,最后通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已经传唱深远的经典歌曲,形成命运的大合唱。

籍籍无名者的矿井小诗是一手的生活经验,是带着泥土的生活;朱践耳的谱曲和发表代表着“中国最高水平的作曲大家”的正声雅乐;雷锋作为公众典范人物,其日记摘抄起到了极具传播价值的桥梁作用;任桂珍和才旦卓玛的演唱,让歌曲广为传唱,标志着当时人民群众文化审美的主流。

作品是文化价值的载体,也塑造着新的文化价值。作者关注歌曲形成过程中的



文化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自觉性的体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个奇崛不仅是艺术作品的高超,还包括人物命运和命运交合的奇崛;这个艰辛,包括艺术作品形成、人物命运、时代发展的艰辛。诸多人物命运、时代发展叠加,造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厚度。这样的艺术效果得益于作者敏锐的选题眼光和对故事文化内核的提炼能力。首先,理解人物精神品格,分析故事

文化逻辑,寻找素材文化基质。本书涉及的人物具有共性的精神特质:爱党敬党、崇尚理想、无私忘我、爱岗敬业、艰苦创业等。如诗歌的创作者姚筱舟身上的故事是一个波澜曲折的命运故事,但他并没有因为现实命运禁锢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以开阔的视野,深沉的思想,敏锐的观察,浓郁的家国情怀,写出人民命运的心声,也是时代的大音。作者正是从这些时代价值观念中,找寻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从而梳理出了“风雅颂”的艺术基质和文化内核。

其次,深谙文化主导的创作机制,具有确认文化内核的自觉性。作者有意识地去梳理、挖掘、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文化命题,并将之重新组合消化,形成文化内核的提炼,以便指导创作。

最终,重新审视了“风雅颂”之间的逻辑关系,实现了当代艺术对传统文化的赋能。报告文学《党的光照射我心》看准著名“山歌”里面“时代的血液,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能量,用时代的艺术眼光和激情追溯其发源的脉络,重新审视“风雅颂”之间的逻辑关系,激活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

## 阐释人民民主观核心内容

□杨光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林建华、王晶所著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重庆出版社)一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观念演变、民主政治建设等进行了系统阐释,重点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观的核心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在于人民当家作主。该书的优点和特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民主话语的创新。必须加强研究,在民主领域推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说“中国话”、做“中国事”,实现中国民主领域的观念创新、话语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该书即是“四个创新”的初步探索和重要成果。该书系统阐释了作为新概念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发展脉络、科学内涵、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等,贴切使用了“人民至

上”“有事好商量”“我将无我”“胸怀天下”等具有新时代原创性的中国的民主理论和话语,强调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其二,民主观念的回归和升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政治学学者开始批判、反思西方政治学中的流行话语,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协商民主理论的转向。协商政治是基于协商—共识的民主模式。基于治道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其诉求和旨归必然是实质民主而非只是政体意义上的程序民主,这就体现出了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异。该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面阐释,表明在观念上我国在实践中已将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设蕴含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初步构建起具有中国自主的民主话语体系。

其三,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在古典意义上,民主是人民主权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其政治实践形式至少有四种:一是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二是代议制下的选举民主,三是代表制下的人民民主,四是社会自治意义上的人民主权。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背景和逻辑中,“民主”的含义变成了“竞争性选举”。该书“关键在于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章强调了“人民至上”的民主观念,论述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主体地位,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新时代中国独特的贡献。

《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

## 孙中山的海南因缘

□何杰华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的“长编”内容之庞杂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为孙中山先生编“长编”的工作也从来不乏有大家参与其中,相关著作之数量也可称“车载斗量”。钟业昌先生在这本《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海南出版社),通过史料钩沉完善了孙中山先生的“长编”。读者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并不如宋氏家族那般为世人所熟知的一群海南人,如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的“文胆”王斧、孙中山先生的“布衣之交”林文英等等。这一张张通过钟业昌先生之笔复现的鲜活的海南面孔和他们追随孙中山先生的经历,“清晰勾勒出清末民初海南的历史轮廓”,成为了当时之海南与当时之民国及孙中山先生之间密切连接的有力证据。

要如钟业昌先生这般为此等“长编”作如此有效的补充,确实是需要下“笨”功夫。它既需要有“快手”,也需要长着“火眼”。只有成为这样的“能人”,下足了功夫,才有可能如他那样收集到如民国四年财政部印刷局出具的《财政说明书》等珍贵史料,才能完成书中《革命新纪元》《琼崖新纪元》《他日,必成大都会也》《琼州形势,最有可为》等分量极重且意义深远的章节的创作,才能让本书的读者对其所勾勒的“清



末民初海南的历史轮廓”信服。让我信服的,是其对“琼州改设行省”这一历史事件的论述。一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的海南岛,直到1988年才建省,成了全国建省最晚的。在此之前,有没有人倡议过海南建省?是谁?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关于此,专家意见不太统一。

有人认为文昌人潘存提出的。如《海南日报》刊发的钟一先生的《建省方略十多万言》便认为潘存提出过《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证据是钟一先生曾看到过一篇陈

宗舜先生写的《海南建省运动纪要》。

另一种观点,便是认为曾任孙中山秘书的陈治安是首倡者。海南师范大学的陈平殿老师在其所撰的《海南建省首倡者考》(刊登于2021年第一期34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一文的摘要中便如是说:“关于‘谁是海南建省倡议第一人’的问题,学界历来有潘存说,张之洞说,孙中山说等多种说法,但都缺乏第一手史料的支持。文章通过搜集各方原始史料,认为首倡海南建省者应该是海南琼山人陈治安,民国元年他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提出了海南建省的倡议。这是有原始资料记载的史上第一次提出海南改省。从而开启了民国时期海南的建省运动。”

钟业昌先生则在《孙中山与海南》这本书中对以上两种说法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既为“潘存说”找到了侧面的证据,又系统地梳理了民国时期倡议海南建省的全过程。

我不认识钟业昌先生,但“见字如晤”。通读完这本《孙中山与海南》,写完这篇评论,我大概知道了钟先生写史所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宁失之繁,无失之略”与“闻见异词,两存其说,以求其是”。这也是我应向他学习的地方。

《行走的脊梁》

## 把光明打捞进凡人小事

□简墨

终于读完了《行走的脊梁》(济南出版社)。读得很慢,是因为,很多东西需要反复品咂。像一个不曾开锁的盒子,里面装了珍珠。过两天了,打开“盒子”,细细摩挲,又有一番新的感动。

读者感动,作者得先感动。作者徐锦庚讲过:“融入人物内心世界,触摸最感动自己的地方。”这本书写到了许多小人物、小细节,对这些样本般的事物,他无不倾注了感情。

他写一位“懒汉”治村,不按常理出牌,却处处以公心行事,小人物有着大情怀。他以事见人,叙述为主,穿插抒情,偶有调侃,将这个人物立于纸上。

徐锦庚持有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普遍态度:尊重,谦卑,关怀,赞赏。在他笔下,多是突破文体的探索。“队伍往前挪动,前面剩七八人时,老者作抹脸状,头略下倾,以手遮面。剩五六人时,他犹豫一下,离开队伍,慢慢踱到队尾,重新排队起队。前剩五六人时,他又离开,踱到队尾,接着排队。”——这是一位老父,从外地来到女儿工作的地方,一次次排队,为的就是看“春运”卖票,顾不上看



回家的女儿一眼。而这是徐锦庚式的句子,有着指纹一样的独一性。它们如同花草满坡,自然而然,长在他文字的草原上。最直接的感受,是来自文体上的美妙错觉——这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 “写什么”,为写作者的发端;“怎么写”,才是这个人的千里迢迢。文体杂糅,文体的诗性特征……文字带给读者的

欣喜,大抵出自写作者的诗性。诗性,在人,会对美好事物保持敏感;在文,则带有不合时宜的天真与热忱。它出于求美存善的情怀,也与时代精神有关。

他定住心,只取报告文学这一“瓢”饮。在这片大地上,徐锦庚到处奔走,一个冬天一个夏天也不放过地寻寻觅觅:台儿庄、拉萨、开化、曲阜、曹县、东营、济南、台湾……“又淘到一个宝了!”成了他的口头语。

他口中的“宝”,是共和国的脊梁。那些从没见过的人,成了他珍视的朋友。视觉、听觉、形状、哲思、动词、名词……在这本书里,它和它之间,可以互相串门,每一篇几乎都有某个点,神秘地打动了读者,自然得如同人感到风来,却没有看见风。生活的纹理,人的信念,支撑社会秩序的根基……无不在他笔下生香。美好,有力量,积极向上……林林总总的凡人小事,化成一个个不动声色的细节,富弹性,无凝滞,圆融入口,经得起反刍。

他选取了诚实的表达方式,将世情的常识与心灵的韧度拧成一股绳,把光明打捞进文中——光明,无论是报告文学的主体属性,还是作家本人的秉性,都导致了这种选择。只要有人存在,对于光明的边界探索就不会终止,还可以一次次抵达高峰。

《“南海I号”船说:从中国水下考古看海上丝绸之路》

## 微小切口呈现大宋风华

□黄智 刘帅



大宋淳熙十年(1183),一艘当日从泉州出发的商船在广州补充了一些铁器和美酒后继续南行,随即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谁也没想到,再次听到有关这艘商船的消息,已跨越超过840余年的时光,直到1987年的那个春天……“南海I号”从1987年被发现到2007年被整体打捞出水,再到如今基本完成发掘,考古工作经历30余年。“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一段展示着南宋富饶的生活生产,中国与中亚、南亚以及非洲等地外贸历史的神秘“船说”也徐徐展开。

《“南海I号”船说:从中国水下考古看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教育出版社)不仅为读者讲述了一艘保存完整的沉船和大批精美的文物,更重要的是以一手研究资料和精美的图片,向读者生动展示了宋元时期我国跨海贸易全球顶尖“装备制造”,以一个微小切口呈现了大宋风华。

从历史价值上看,书中许多图片和资料均为首次披露。书中展示的陶瓷器、铜铁器、金银器、钱币、动植物残骸等,揭秘了我国宋代海外贸易盛世的繁华,蕴藏中华文明深厚的积淀。出水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陶瓷器,以及整套铜砗码、天秤与沙特塞林港附近出水的几乎一样,大量的铁器,以及各类船员用品、货币等文物,填补了历史人文和丝路研究的空白。

从考古意义看,“南海I号”是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对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等提供了典型标本。本书在全面考证与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南海I号”从发现到打捞的全过程,提炼、发掘中的技术创新以及考古成果与船载文物反映的海外贸易影响,对于中国古代造船史、航海史、物产史、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等海洋文明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启迪价值。作者魏峻先生,在北京大学完成了11年的考古专业学习后,调整了研究方向,由新石器时代考古转变为水下考古,并于2005—2014年间担任“南海I号”考古领队。2019年受到“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录制“考古笔记2”,由于节目时长限制,很多精彩的细节无法呈现。魏峻先生通过调整文本结构,增补大量文献内容,分章列节,最终形成该书书稿。

从现实角度看,本书首次向读者阐明了“南海I号”与“中国水下考古”的关系。目前,通过南海密址的考古发掘重新认识广东地区南宋时期被认为式微的窑业生产面貌,确认“南海I号”和以南越国官署遗址为代表的广州贸易港口出土相关产品来自该地区窑场,开创“三南”(南海密址、南越国官署遗址宋代遗迹和“南海I号”)合作研究模式。

从出版价值看,本书是一本以“南海I号”为专题和载体,研究“南海I号”“中国水下考古”“宋代海陆贸易”的书,揭开了中国水下考古由“南海I号”的发现而发端,由“南海I号”的打捞、考古完成而领先世界的整个历程,从微观上反映出民众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史实。

百舸争流千帆竞,涨海声中万国潮。千年来,像“南海I号”一样,往来货船如同珍珠在大海上编织起见证中外交流和“一带一路”发展的历史,贯古今、串未来,莹莹光无尽。